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刘东 主编

转变的中国

——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美]王国斌 著 李伯重 连玲玲 译

作为一部富于创意和挑战的探索性著作，本书在广泛汲取和甄选中西史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从经济变化、国家形成和社会冲突三方面入手，通过比较中国与西欧之长时段历史的异同，否定了长期盛行的各种西方中心主义研究框架，也展现了中西社会、经济、政治史的总体脉络和各自特点。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主 编 刘 东
总策划 周文彬

转变的中国

——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美]王国斌 著 李伯重 连玲玲 译

本书责任编辑委 刘 东

江苏人民出版社

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Copyright 1997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 London

根据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译出

书 名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编 著 者 王国斌
责任编辑 张慕贞 杨建平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印 刷 者 通州市印刷总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页 2
字 数 245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321-0/F·555
定 价 14.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列强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人逐步地改变关于世界秩序的古老观念,却远远没有改变他们反观自身的传统格调。50年代以来,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丰富的成果,以致使我们今天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不仅要向国内读者译译海外的西学,也要系统地输入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可能会加深我们 100 年来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它的学术水准也再次提醒:我们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就将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也正因为这

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古老的中国警句便仍然适用,我们可以借别人的眼光来加深自知之明。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从几代学人的成果中撷取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见解时,我们自然不能从各家学说中只挑选那些我们乐于接受的东西。如果那样做,这“筛子”本身就使读者失去了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但这次译介毕竟只是初步的尝试,成败利钝,欢迎论评。

丛书编委会

序

吴承明

近 30 年来,中西比较史学的研究有很大的进展,人们突破了长期支配这一研究领域的西欧中心主义,也突破了 50 年代以来流行的“对西方冲击的回应”模式。在中国,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颇受注意,^①但他提出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的主张,并非认识中国特色的最佳途径。只有比较两者之异(differences),又比较两者之同(similarities),才能看出各自的特色。要做好比较研究,需要对西方的(至少是西欧的)和中国的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有同等深度的认识和学术根底,又需要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有深思熟虑的修养。本书作者王国斌教授具备这两方面的要求,并善于提出有争议的问题,这就使本书能启迪思考,引人入胜。

本书是从经济变化、国家形成、社会抗争三个方面来做中国和西欧的历史的比较研究,并希望从比较所得的更大范围的社会演变轨迹中,来改进人们对社会

①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New York, 1984, ch. 4.

发展的看法。它是迄今我所见到的惟一的一部从整体上考察、在观点和方法上都具有新思维的中西比较史学著作。全书广征博引,纵横论述,有如行云流水,目不暇接。这里,我只就若干历史观点和方法论等作些讨论。

多元论是比较史学的出发点。多元论并非新论,尤其在人类学和文化史方面。A.J.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度在中国颇受青睐,也许是有某些偏见。^① 但中国文明决非源于《出埃及记》,则是无可置疑的。然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例如本书所着重讨论的资本主义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两个近代化的标志,它们是多元的吗? 本书作者在“导论”中的回答是:“要超越欧洲中心论,首先应当回到欧洲。应当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发生情况,作为历史过程而非抽象的理论模式,认真进行讨论”。这是很有见地的。作为抽象的理论模式,它应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就会出现非西方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只是“回应”西方这样一种单元论。而作为实际的历史过程,与原来具有完整的文化和历史的社会的同类过程做比较研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里,作者显然不同意 50 年代以来在美国盛行的逻辑实证主义,即从一般前提和初始条件推出预言性的结论的研究方法。作者在本书上编(即“经济变化”)中批判了当代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变成了主题狭隘、远离尘世的数学讲演。而实际上,逻辑实证主义之引入人文和社会科学是从历史学开始的,并从历史学上开始证实和证伪的辩论。^② 在历史学上,这种方法也常使主题狭隘,

① A.T. 汤因比 1975 年去世。生前他曾说:“如果说,21 世纪是东亚人的世纪,并非惊人之语”。

② 逻辑实证主义的引入见 C. C. Hempel: 《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 1942。证实论见 W. Dray: 《Laws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 1957。证伪论见 K. R.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1957。

就事论事,“用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①并且,常常会导致目的论、决定论的历史观和预言式的结论。关于这种历史观以及历史不是预言,作者已在本书中反复申论,我不再置言。我只想说,就比较史学而言,不需要一位就事论事的裁判官。

中西比较研究,是要找出双方在近代化经历中的“异”和“同”,并且对之做出评价。这就需要一个行为的价值标准或参照系。如果我们有一个独立的、可普遍运用的价值标准或客观参照系,那将是十分动人的,但也将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样一种标准,如果不是抽象的假设,有如逻辑实证主义的前提,就是按照先入为主的原则建立的、即最终是出于西方经验的大杂烩。本书作者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比较研究方法,即一方面用欧洲的经验来评价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则用中国的经验来评价欧洲。通过互为主体,得出新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我想,这也许是惟一可行的、至少是公平的比较史学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很朴实,但应用起来并不简单。在我看来,当以本书中编(即“国家形成”)中运用最为成功。这是因为:根源于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中西之间在国家理论和实践上的差异,远较双方在物质生活上的差异为大。政治比之经济有更大的选择性。例如,改变中世纪支离破碎局面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几乎是欧洲的特有语汇,因为中国早已是、并且一直是具有民族认同感的统一国家了。因而,本书作者把国家组成追溯到秦汉和罗马帝国,并英明地把考察走向“近代”的起点定在1100年,进行“跨越长时段”的分析。这才能看清国家组成的道路,在基本不同的道路上也有诸如贵族独立和社会精英干政等相同或近似的问题,和不时会出现的两条道路的接触点。

① R.M.Solow 的批判语。见所著《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s》,刊于《Economic History》,75:2, May 1985。

本书主要是从国家与经济、国家与社会、国家维护社会秩序这三个方面来进行中西对比研究的。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功能、行为规范及其效果,便是评价的标准。应当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国家在这些方面多半处于优势。到18世纪,欧洲已进入近代国家,这对中国情况如何呢?如何评价帝国晚期即明清中国,是近年来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本书作者早就参与了这项研究,并曾经以关于清代粮食储运制度的专著而闻名。在本书中,他结合历史传统,对帝国晚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和经济的关系做了全面的分析,并给予我以为是适当的评价。从本书的研究中可以看出,19世纪以来,欧洲国家思想和制度的影响,包括民主和公众领域等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完全陌生。而以个人为单位的和国家与经济分离、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国家组成模式,迄今未在中国生根;而中国源于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些国家组成原则,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种双轨制的研究方法,在本书下编(即“社会抗争”)中,运用得也很成熟。本编着重讨论的,如粮食骚乱、抗税活动等,都是较小范围内的集体行动。就这些事件本身的发动、经过以至结局而论,在中国和在欧洲基本上是相同的。而本书的研究,是把它们放在政治、社会的历史“大环境”中去考察,中西之间的差异性就明白显现出来了。据作者的考察,在18、19世纪,欧洲各国已大力推行全国性的以至国际间的自由贸易制度,食物骚乱常是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作为地方力量维护旧体制的斗争而出现的,到19世纪下半叶基本上停止了。在中国,除了商人贩运粮食外,18世纪卓有成效的国家调剂粮食的漕运和仓储制度于19世纪遭到破坏,食物骚乱更多是由于供给方面的不稳定或不充足而来,到20世纪愈演愈烈。18世纪欧洲的抗税行动,主要是由于增设新税尤其是城市工商税引起的,当新兴的民族国家完成财政制度的改革后,集体抗税在20世纪逐渐消失。中国的抗税行动则始终与田赋和农民以至士绅攸关。19世纪以来,中央政权虚弱,以及地方团练、秘密

会社分子参与抗税活动；到 20 世纪，抗税活动具有了“向前看”或说革命斗争的性质，这又是和西方迥异的。

本书进一步分析了大规模的叛乱和革命问题。在这里，作者基本上不采取经典诠释学专力于动机、意图的研究方法，但在用物质利益或理性抉择解释群众运动时，他十分重视文化和思想的作用：“大规模的叛乱和革命，都包含着物质变化和新世界观的建立”。在其他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作者似乎常持二元的或调和的观点，也许，这正是作者的一种方法论的思考：他在本书的结论（即末章）中指出，比较研究在不同历史轨迹中发现相似的时段，在因果律预期的一致中发现不同的结局，比较史学给出更大范围的现象的积累，有助于使人们的认识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

本书十分重视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在上编（即“经济变化”）中，作者实际是把经济发展的动力作为比较研究的标准。他认为：16 至 18 世纪，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都适用亚当·斯密的增长理论，即贸易和市场的扩大，通过交换中的比较优势，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而后者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乃是经济发展之源。在这种“斯密型动力”的推动下，欧洲和中国的农业经济，包括农村手工业，其发展道路大体上是相同的。但到 19 世纪，欧洲的农村手工业被城市的机械化工厂工业所代替，更适用于新古典主义的以储蓄和投资为动力的增长理论，遂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分道扬镳。19 世纪西方的侵入，扩展了中国的贸易和市场，而其结果主要是扩大了斯密型动力运作的空间，并未根本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直到 20 世纪前叶还是这样。

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也许与斯密型动力并不是那样截然不同。用新古典主义理论研究传统农业，例如 T. W. 舒尔茨的著作，^①不能说没有贡献。不过，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完全忽略了

① T. W. Schultz: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New Haven, 1964.

制度、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而本书作者始终重视这些方面，以及国家的作用，这在中西比较研究中是十分重要的。古典主义增长模型给出一个人口与资源的悲观结论，成为史学家议论的焦点。在这个问题上，本书作者对中国和欧洲的人口行为与经济的关系做了精湛的分析，令人信服地说明：直到 19 世纪，尽管家庭和生产组织迥异，中国的人口危机并不比欧洲更大。作者认为：19 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摆脱了古典主义增长终极的限制，而中国则否。那么，20 世纪的中国如何呢？对此，作者也有较详的分析。这种分析，实际上也用了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的和二元经济论的研究方法，而在最后的结论中，不免有若干不确定的因素以至怀疑论的情绪。这并不奇怪。就历史学来说，恐怕经常是要到下一个世纪才能议论前一个世纪的事情。

本书未曾提过，也许作者并不承认，有所谓历史哲学或元历史学(meta-history)。的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对历史的怀疑和忧虑在六七十年代消失后，在西方已没有人再谈论这种“超历史的”或“智慧的”思维方式了。据称历史学已变为科学。不过，本书中，至少在“经济变化”编中，作者似乎是承认有普遍发展规律的。这里，我想以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的看法来结束这篇序言。傅衣凌教授在晚年提出“中国传统社会多元论”和“明清社会变迁论”。^①他认为，在 16 世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已发生走向近代的变化，但由于中国社会的多元结构，这种变化起伏跌宕，以致中断、后退，但到最后，并未能摆脱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

① 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结构》，刊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第 3 期；《明清社会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

鸣 谢

本书是我关于中国与欧洲历史变迁模式的比较研究的一个成果。能有这个机会与中国学者分享此成果,不胜欣幸之至。我对经济变化、国家形成和社会抗争等问题——即本书的三个基本主题——的兴趣,可以追溯至 30 年前在大学时代与查理·蒂里(Charles Tilly)教授的一段学缘。15 年前,我开始认真地研究这些问题。自 1992 年起,我更把大部分时间投注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中。我在此项研究中,曾受益于许多学者的指教与鼓励。在中文版的问世方面,我非常感谢吴承明教授在百忙之中,为本书撰写了序言。我很幸运地得到李伯重教授的合作,将本书翻译为中文。他对此计划的热心及对中国经济史的专擅,对本书的产生至为关键。他将此书译出后,我又根据新的构想,重写了第九、第十两章。这两章蒙连玲玲小姐译为中文,并经李教授对译文作了订正。全书译完后,我对译稿作了校订。在校订时,连小姐也提供了相当的协助。他们的努力当然使得本书有所改进,但其中不足之处仍是笔者的责任。这里我也要说明:为了便于中国读者的阅读,我对原文作了相当大的调整和改动,因此中文版在不少地方与英文版有所不同。此外,我也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和丛书主编刘东教授对此书的厚爱,

使得此书得以列入该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并在很短的时期内与中国读者见面。最后,我还要强调:在这本书里,我只是提出了一些方法,来比较中国与欧洲历史变迁的动力。我希望借此抛砖引玉,促使更多的学者从事此方面的研究,从而拓宽并深化我们对“中国特色”的了解。倘能做到这一点,我写作此书的初衷也就达到了。

目 录

序 吴承明(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 1

鸣谢 1

导论 1

上编 经济变化 4

前言：比较经济史与发展问题 4

第一章 明清及近代中国的经济变化：同欧洲的比较 7

一、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变化诸问题 7

二、近代早期欧洲经济成长的动力 10

三、斯密型动力在中国 12

四、对斯密型动力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15

五、斯密与马尔萨斯：中国与古典经济学 24

六、结论 30

第二章 近代早期欧洲与明清时期中国工业扩展的动力 33

前言 33

一、西欧的农村工业与人口变化 34

二、中国的农村工业与人口变化 38

三、从原始工业化到工业化 41

四、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之比较 46

五、欧亚各地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所谓的“增长极限”的不同反应 51

六、技术变化的力量与历史发展的机遇 53

第三章 从欧洲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史与经济发展 56

一、20 世纪的中国经济 56

二、企业的组织变化在中国与欧洲的作用 57

三、中国农业经济中的斯密型动力与马尔萨斯型动力 61

四、民国时代中国经济成长的空间层面 63

五、1949 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 72

六、从欧洲经济史和发展经济学中所获得的更多教训 74

七、经济史与经济发展 77

中编 国家形成 81

前言：欧亚国家的形成 81

第四章 近代国家形成的方向 84

前言 84

一、早期帝国的形成及其遗产 86

二、以长期的眼光看近代国家形成 89

- 三、欧洲的国家形成 93
 - 四、中国的国家形成 96
 - 五、从欧洲的角度看中国的国家形成 100
 - 六、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一种中国国家形成观 103
 - 七、结论 109
-

第五章 近代国家形成中的意识形态与制度机构 111

前言 111

- 一、近代早期欧洲及明清时期中国内部的国家—经济关系 112
 - 二、民族国家与农业帝国形成中的中央集权及地方秩序 115
 - 三、中国与西欧的地方秩序诸问题 116
 - 四、18 世纪对中央控制之追求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123
 - 五、农业帝国之滑入近代以及“公众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出现 130
-

第六章 1850 年以后近代国家的形成 136

- 一、近代世界中的冲突 136
 - 二、19 世纪中国的国家形成 137
 - 三、20 世纪中国国家形成的轨迹 140
 - 四、从历史的角度看 1949 年以后的中国国家 144
 - 五、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 151
 - 六、中国国家的延续 154
 - 七、结论：历史上的和理论上的国家形成 156
-

下编 社会抗争 159

前言：政治与抗争 159

- 一、民众抗争：研究的问题与难点 159
 - 二、欧洲的民众抗争 161
 - 三、中国的民众抗争 163
-

第七章 食物骚乱 165

前言 165

- 一、中国的食物骚乱 167
 - 二、欧洲的食物骚乱 174
 - 三、中西食物骚乱的比较 182
 - 四、结论 191
-

第八章 抗税运动 195

- 一、抗税事件 195
- 二、政治环境变化中的抗税意识形态 197
- 三、19 世纪中期长江中游的抗税运动 201
- 四、1840 年代和 1850 年代江南的抗税运动 205
- 五、1850 年代和 1860 年代山东的抗税运动 208
- 六、从明清时期的角度来看 19 世纪的抗税运动 209
- 七、谁卷入抗税运动 211
- 八、抗税运动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213
- 九、20 世纪的抗税运动 215
- 十、抗税运动同革命、国家形成及政治变化的关系 216